

「日記中的蔣介石」兩岸學術研討會紀要*

吳佩樺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碩士生

前言

蔣介石主政期間，國內外風雲丕變，適逢現代中國形塑的重要轉捩時刻。政壇領袖動見觀瞻，言行、決策影響著國家未來的走向，而在官方文書以外，蔣介石個人同時以更複雜的面貌，留在自我反省與時人的觀察記載當中。

若說《蔣介石日記》是一個公私領域相互融匯的場域，他人日記中的蔣介石，則有如鏡面反射，臺前幕後，各方政治暗流與潛在的話語權爭奪，不僅藉他人觀察蔣介石，更經由蔣介石探究中國近現代變局的種種軌跡。

繼 2010 年「蔣介石人際網絡研究」、2011 年「蔣介石日常生活研究」及 2013 年「蔣介石及抗戰時期的中國」三大主題，2014 年 12 月 19 日至 21 日即以「日記中的蔣介石」為主軸，圍繞蔣介石、陳誠、陳克文等多種日記，於金門救國團青年活動中心召開第四屆蔣介石日記學術研討會。會議中總計發表 21 篇論文，分為七個場次，首先由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教授兼人文中心主任周惠民及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長金以林主持開幕式，回顧歷屆蔣介石日記學術研討會成果，感謝各位與會學者並期許會議成功，隨即展開專題論文發表和對談。

* 本次研討會由財團法人中正文教基金會、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國史研究室、國立政治大學人文中心蔣介石與現代中國的形塑研究團隊、中國近代史學會主辦。

第一場 表述：虛構與真實

第一場討論由金以林主持，會議伊始，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國史研究室副研究員李玉剛發表〈蔣介石日記觀察片論〉，從心理學視角探討如何看待蔣介石日記中的虛構與真實，並提及使用日記注意事項與研究心得，藉此為本次以日記為主要材料的研討會揭開序幕。日記中的虛構與真實，不僅是心理史學探討範疇，同樣可應用於政治、軍事史等各方面研究。第二位發言人輔仁大學歷史學系教授林桶法〈從蔣介石日記、王叔銘日記、胡宗南日記看蔣胡在關鍵年代的戰略紛歧〉一文，比較三種日記，傳主對人物臧否言論中的好惡標準似無太大差異，但若以國共內戰晚期為例，則可清楚看到統帥與指揮官戰略思考的落差，王叔銘、蔣經國則在胡宗南與蔣介石之間扮演互相傳達的角色。各方論述立場不同，互有虛實，因此經由參照多種日記，將使討論更為可靠。第三位發言人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博士班研究生陳佑慎〈「模範軍」的實與虛——「胡宗南日記」中蔣介石的黃埔系軍事經營〉亦注重日記中虛實問題，以軍史角度探析素有「模範軍」之稱的第一軍真實面貌及其內部存在的積弊。至於第一軍是否被高估？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張力與本文作者對話認為，第一軍「模範」形象雖未必得到其他部隊認同，卻代表著蔣介石的期望，亦是一種特殊的情懷。

第二場 時變：個人與群體

第二場討論由張力主持，分別探討蔣介石與陳誠、蔣介石與銀行家、蔣介石與地方勢力等關係，隨著時局變化，當政者如何與個人或群體互動，反映出的國家發展走向值得深入考察。國史館審編處處長何智霖發表〈從陳誠日記看江西剿共時期的蔣中正〉，分別就九一八事變、營救鄧演達、整編剿共部隊、第四次圍剿失利等主題觀察江西剿共時期的蔣介石。身為蔣介石信任的得力部屬，陳誠軍事實力在圍剿失利後卻不減反增，實為蔣介石因應日軍進犯所導致的腹背受敵局面，多方考量後的決定。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研究》編輯潘曉霞〈北伐大變局中的銀行家與政治〉一文借助梁士詒、張嘉璈、陳光甫的經歷，討論銀行家與政府的關係，從而探究近現代中國政治大背景下，銀行家遭逢的困境以及各方兼具矛盾與合作的複雜面相。北伐開始，蔣介石如何與銀行家建立關係？此關係是否影響國民黨的性質？蔣介石本身屬於如左派人士聲稱的「資產階級」立場，還是傾向於藉政治權術利用銀行家？諸多問題深具啟發。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英文刊物 *Journal of Modern Chinese History* 編輯劉文楠發表〈尋找理想的中央—地方關係——從閻錫山、徐永昌日記看蔣介石與晉綏的博奕（1931-1934）〉，基於新文化史視角，從變（特殊性）和常（規範性）兩方面討論

蔣介石處理地方實力派時，如何將「中央—地方」關係納入合理的政治制度框架。以晉系為例，由於閻錫山與徐永昌性格、背景及政治立場影響，蔣介石亦審時度勢，有所讓步，中央和地方遂能達成共識，在與地方實力派互動中，蔣介石逐步尋覓理想的「中央—地方」關係。國史館館長暨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兼任研究員呂芳上指出中央化是國家發展的趨勢，除了山西以外，各省派系與蔣介石的關係皆可進一步討論。

第三場 思潮：政治與學術

第三場討論由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教授劉維開主持，主要關注政府與學界、知識分子的關係。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國史研究室副研究員張靜發表〈蔣介石與抗戰前的浙江大學（1930-1937）〉，考察 1930 至 1937 年間浙江大學校務發展的情況，從困境到校方及行政當局的應對，著重探討蔣介石在其中的角色。蔣介石曾多次視察浙江大學，對其校務多方干預，雖雙方在抗戰前形成良好互動合作，該校自由主義教育理念卻與國民黨教育政策差異頗大，矛盾終將浮上檯面。中原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助理教授皮國立〈知識分子眼中的蔣介石與國、共兩黨——以《竺可楨日記》（1936-1949）為考察中心〉同樣聚焦於浙江大學校長竺可楨，從日記中人際網絡與訊息交換，探究其政治傾向轉變的過程。和多數知識分

子同樣抱持理想主義的竺可楨原無黨派成見，隨著國民黨弊病叢生，漸失學界師生的支持，加上竺可楨與蔣介石等高層連繫的中介者陳布雷去世，影響其轉向支持共產黨的決定。本場討論最後由國史館主任秘書暨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系教授陳立文發表〈中英平等新約交涉期間蔣介石與顧維鈞的對話〉，從戰時中英外交出發，探討 1943 年中英平等新約交涉期間的國際氛圍與雙方談判、爭執過程，身為幕後決策者的蔣介石與實際出使英國的顧維鈞，分別如何看待這場爭取平等的挑戰，又如何努力達成目標。作者回應現場討論時提及，蔣介石一旦身處國家領導人的位置，無論對竺可楨或顧維鈞，彼此必然產生思考模式與觀點的差距。愈遠離政權核心，較不需考量全局，通常抱持更多理想主義，而決策中樞得顧慮重重，可能最後結果顯得不盡理想，若以後人全知觀點大加撻伐，卻也未免有失公允。

第四場 敵友：較量與抉擇

第四場討論由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長汪朝光主持，主要分析蔣介石與毛澤東、汪精衛兩位政治博弈的對手，如何各懷心思，希望帶領國家走上不同的道路。金以林〈1942 年前後的毛澤東與蔣介石〉一文意圖超越成王敗寇的迷思，關注國共關係較為緩和的 1942 年前後，毛澤東與蔣介石如何決策處事。蔣過於自信，認為中

共將會分裂而不攻自破，實際上毛凝聚黨內戰鬥力，逐步壯大，最後公開提出聯合政府主張，國共關係隱有翻盤逆轉之勢。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國史研究室助理研究員李志毓〈汪精衛對日求和的內外環境及其思想脈絡——以臺灣「國史館」藏《汪兆銘史料》為中心〉討論汪精衛主和的思想脈絡及促成其思想演變的國內外局勢。汪精衛出於對「歐美列強制裁日本之可能性」與「國民黨領導抗戰勝利」兩者感到絕望，選擇了親日，並產生一套自行言之成理的看法，認為自己代表多數民意。至於民意究竟如何？相較於蔣介石軍人形象，汪精衛具文人特質，思想開明，支持民主憲政，因此確實得到許多知識分子的認同。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長黃克武與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博士班研究生趙席叡合撰〈汪派知識人心中的領袖：以周佛海與陳克文抗戰期間日記為中心的探討〉一文，即討論汪派中的知識分子如何看待蔣介石與汪精衛兩位「領袖」，同時反映出兩人不同的領導風格。如陳克文對蔣常有微詞，也能精確分析汪的性格弱點，而周佛海本屬蔣的人馬，對蔣較為尊敬，未見負面批評之語，對汪的態度則存有不願全然效忠的投機性。關於本文當中日記的使用，劉維開特別指出，由於陳克文為事務官，職位並非固定，各時期接觸到不同的人事，因此閱讀其日記需注意其人當時所擔任工作，由何種立場出發，如何影響其觀點。

第五場 困境：衝突與省思

第五場討論由周惠民主持，探究面臨政治、軍事困境的蔣介石及其周邊人物的矛盾、互動關係，而問題背後是否牽涉更多複雜因素。透過本場討論，更一探現代中國形塑的諸多關鍵時刻，鑑往知來，今時今日當有所思。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國史研究室助理研究員呂迅〈論蔣中正與史迪威矛盾中的中共因素〉一文認為，蔣介石與史迪威矛盾的關鍵即是中共，史迪威與中共往來對中美關係的影響主要自1938年起，擴展到馬歇爾使華、國共談判及冷戰初期美國對華政策基礎。國史館助修蘇聖雄〈甲申三百年——陳誠日記中的時局和蔣中正（1944）〉聚焦於時局艱困的1944年，陳誠觀察時政，多有建言，特別注意到高級幹部腐化為國家危機根源，而蔣介石並非不知，卻無法興利除弊，最終導致全面潰敗。1949年國民黨政權敗退的原因，早在國共內戰以前即有跡可循。劉維開〈蔣中正在1948年的處境——以陳布雷、陳克文、熊式輝日記為中心的觀察〉從另一視角探析蔣介石面臨的困境，1948年無論在軍事、政治人事或財經各方面連串的失敗，導致蔣介石威信下降，備受批評，影響其領導地位。蔣力圖堅持到底，但似乎已預見到最後的結局。本場討論中，如林桶法提問，陳誠等人日記時常批評時政，但輪到自己當政時，是否真能將改革理念付諸實行？由於各篇論

文以日記為主要材料，跟隨日記作者的立場與心路歷程，容易帶有感情，用同理心為其人做各種解釋而導致見解過於主觀，需特別謹慎。另外亦討論到各人寫作日記的習慣，記載內容多寡與其所掌握材料相關，如沈錡日記之所以能鉅細靡遺，是因擔任秘書，所有會議紀錄皆彙整其手，可直接抄錄於日記當中。

第六場 新局：機會與挫折

第六場討論由呂芳上主持，隨著中國抗戰勝利，一方面國際地位得以提升，國內卻戰火再起，可謂屢遭頓挫，亦屢現轉機。汪朝光〈示形與決勝——以國共內戰初期國方高層人士日記中的山東戰場為例〉從山東戰場分析國共戰略優劣得失，並論及日記的史料價值。因山東戰略地位重要，國共雙方皆不惜投入重兵，中共戰術靈活，國方卻因蔣介石「遙制」干預過多而屢見失誤，最終由中共取得優勢。每次戰役之後，共方較善於反省自我，國方的檢討常避重就輕，或歸咎於敵人狡詐等，結局如何，似於細微處已見端倪。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國史研究室主任羅敏〈蔣介石關於戰後亞洲秩序的構想與實踐——以戰後越南問題為中心的透視〉通過比對《蔣介石日記》關於戰後越南問題的構想及實際處理過程，探析蔣介石在戰後亞洲秩序建構過程中的地位。為避免英美對中國戰後領導亞洲的防範與顧忌，蔣

介石反殖民主義立場由激進轉為緩和，入越受降卻在法、越之間兩不討好，因中國本身政治問題而導致無法慎始善終。本場第三篇發表論文原為中國國民黨文化傳播委員會黨史館主任王文隆〈從日記中看蔣中正對戰後秩序的構想：以王世杰、傅秉常日記看中蘇關係〉一文，因作者不克出席，直接進行評論，張力對本文標題、用詞、徵引書目與架構等方面提出許多建議。

第七場 突圍：動盪與安頓

最後一場討論由林桶法主持，從國共內戰期間蔣介石與臺籍人士的互動，到國民政府播遷，在縱橫捭闔背後，劇變造成的動盪離散無可避免，時局艱困與徬徨躍然紙上，蔣介石等當政者如何尋求新的出路？國史館簡任協修高純淑〈蔣中正與臺籍人士的互動（1945-1949）：從蔣中正日記與林獻堂日記的觀察〉指出戰後蔣介石對臺灣的認識極有限，而身為臺灣仕紳領袖的林獻堂一直被外來統治者視為籠絡或打壓的首要對象，與蔣雖有短暫交會，卻未能增進對彼此的理解。二二八事件後，政府的種種舉措更讓林獻堂澈底失望，隱退日本，有生之年未再返臺。國立中興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李君山〈從沈錡回憶錄看蔣介石在臺活動（1950-1958）〉著重探討沈錡擔任蔣介石秘書時期（1952-1956）見聞，補充蔣日記所缺內幕環節，兼論《沈錡回憶錄》的史料價值。沈

錡詳細記載許多官方未公開的會議資料，諸如王世杰案、吳國楨出走、孫立人「兵諫」等遷臺後大案，均可尋得端倪。另又如蔣介石積極介入與孔宋家族掌握大權，「官邸外交」時常凌駕常軌外交之上，引發葉公超等專業人士不滿，呈現出政府處理外交事務的一種特殊現象。國立中正紀念堂管理處研究典藏組副研究員暨輔仁大學全人教育中心兼任助理教授任育德〈《雷震日記》中的蔣中正〉一文分析雷震對蔣介石評價，發生過四期演變：第一期，早年雷震初入政壇，對政府及黨政軍領袖較為信任，評價多正面肯定。第二期，1949年遷臺後開辦《自由中國》，抱持自由主義理想，雖仍尊敬蔣介石，也就事論事加以批評。第三期，1958年前後，對蔣介石的領導產生懷疑，批判其獨裁傾向，同時蔣介石在日記中已將雷震稱為「叛徒」，最後雷震遭到逮捕。第四期，1970年出獄後，日記直呼孫文、蔣介石等人名諱並批評其思想與政策，欲超脫國民黨立場，展現求真求實的精神。

在日記研究的綜合討論中，張力指出蔣介石日記有部分錯誤內容，可見領袖或政府高層人士的日記未必最為可靠，還需多方參

考其他記載。至於各人的記載內容是否受其立場或情緒等因素影響？呂芳上回應，日記實屬主觀創作，還可能與寫作當時下意識的靈感相關，因此研究日記時，關注時代背景和寫作語境十分重要。

結語

本次會議發表的21篇論文切入點與討論方向雖各有不同，研究方法上，皆重視日記在研究中的功效，不僅相輔相成，更形如共同勾勒出蔣介石及其時代多元的面貌，其中有戰況危急，有權力角逐，亦有人與人之間信任和矛盾並存的幽微情感。透過各種日記的觀察，彰顯帶有私密性質的日記亦可成為核心史料的重要價值。會後進行金門史跡考察，則有如跟隨日記中人，重遊古往今來，追思戰時歲月，雖世殊事異，所以興懷，其致一也。

蔣介石日記學術研討會即將邁入第五屆，擬以「蔣介石研究回顧」為下屆主題，並將出版本屆研討會論文集，盼此學術傳統延續不墜，學者集思廣益，開創蔣介石與現代中國研究的新視野。